

尹铎,高权,杨梦琪.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J].地理科学,2019,39(12):1849-1856.[Yin Duo, Gao Quan, Yang Mengqi. Re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ity: A Case Study of Ordo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9,39(12):1849-1856.] doi: 10.13249/j.cnki.sgs.2019.12.002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 ——以鄂尔多斯为例

尹铎^{1,2},高权^{1,2,3},杨梦琪^{1,2}

(1.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2. 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3. 纽卡斯尔大学地理系,英国 纽卡斯尔 NE1 7RU)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关键词:失地农民;家;重构;协商;鄂尔多斯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12-1849-08

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由城镇化而引发的土地征用与被动移民现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国城镇化的模式特色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推进。地方政府是城市景观、城市政策以及城市发展进程的强力塑造者、制定者与推动者^[2]。随着地方郊区土建城镇化与农民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完成,失地农民群体亦逐渐显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禀赋对于城镇化速度具有显著的影响^[3]。资源的经济产业优势与国家现阶段对于能源的需求相结合,往往使得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过程得以快速推进,城市面积急剧扩张且市民比例大幅增加^[4]。但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绝非简单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而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在资源城市中如何使失地农民能在城市中更好、更快地营建“新家”就显得更加急迫,独具中国城镇化现实背景的“家”的再建问题日渐清晰地呈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以往对于城市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将征地拆迁者与农民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下,从属于激烈的对抗关系^[5]。研究视野中拆迁与征地的行动者总是强权、暴力地对农民的“老家”进行破坏,而与之相对的农民群体则是被强迫搬离的绝对受害者形象^[6-8]。其实,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成熟,涉及征地拆迁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都已显著增强,征地拆迁大多是建立在互相协商的背景之下。协商后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大多对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具有憧憬和期盼,渴望融入并想要扎根于城市^[9]。这种协商后保持积极心态迁移进城的失地农民群体以及他们营建“新家”的过程目前仍鲜有地理学者关注。这些搬入城市的失地农民群体虽然未曾经历暴力拆迁与激烈抵抗,但他们仍然面临着例如权益流失^[10]、保障缺失^[11]与认同迷失^[12]等许多先前在乡村的“家”中不曾面对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拆迁行为本身,而是应该置于更为广阔的

收稿日期:2018-11-13;**修订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635、41671146、41901173、41601133)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41671146、41901173、41601133).]

作者简介:尹铎(199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E-mail:yinduo@m.scnu.edu.cn

通讯作者:杨梦琪,博士后。E-mail: yangmengqi0988@gmail.com

城乡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涉及其中的不同行动者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拨开失地农民城市“新家”所掩盖的那层忧伤的“迷雾”,并进一步的揭示失地农民基于日常生活营建“新家”所做出的努力。

“家”最直接且具象的概念就是“能够提供遮蔽的物质结构”,例如房屋、公寓等^[13]。但这一狭义的理解却忽视了冰冷的住宅结构之中各种意义所凝结的象征意义^[14]。为了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家”,Blunt与Dowling提出了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他们认为家(home)应具备两层意涵:首先,基于空间化的理解,家是基于特殊地方(place)的物质实体(physical homespace)与社会象征(socio-symbolic)。尽管家可能需要依附于某一地方,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家。家既可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人们对特殊地方的情感想象之中。这种情感可以是归属、渴望与亲密,但也可能是疏离、异化与恐惧^[15]。其次,基于政治化的理解,强调家的营建过程中多元主体对家具有矛盾与冲突的建构与想象^[16]。家的感知不可一概而论,不同的地位阶层、年龄、性别与民族会对家空间的个性、归属感与意义进行截然不同的建构^[17]。总之,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为展现现代性语境下“家”的“空间性”与“政治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18]。

因此,本文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的移民安置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新家”所呈现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失地农民在重构“家”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问题时的协商过程。最后阐释这些协商过程的意义与作用,意图为城乡共享发展红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提供社会文化地理参证。

1 研究案例与方法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全市辖7旗2区,总面积8.7万km²,总人口194.07万人,其中蒙古族17.7万人,是以煤炭、天然气等闻名的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探明储量1496亿t,占全国储量的1/6,天然气探明储量7000亿m³,占全国的31.8%^[19]。2000~2010年,在国家工业高速发展背景之下,鄂尔多斯成为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资源型城市之一。地方财政收入也从15亿元增长到约400亿元人民币^[20],地方财政的快速增长使得政府推进城市化成为可能。2000

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决定拉伸城市核心区框架,建设青春山开发区(2004年正式更名康巴什新区),随后2006年市政府整体搬迁入驻康巴什,标志着康巴什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随着康巴什城市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政府将康巴什原本24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进行征用与收储,累计转移原本从事农耕与畜牧业的农村人口6541人,并将其搬迁转移至康巴什新区中的移民社区。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个康巴什新区呈现出移民社区、主城区与村落区3种空间类型。其中,主城区居民主要为跟随市政府与学校等一同迁入的公务员、教师等城市居民,而村落区居民主要为尚未搬迁与不愿搬迁的乡村农民。

在鄂尔多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征地拆迁补偿加之煤炭产业的巨额利润使得居民的相关闲置资金累积一度多达约260亿元^[21]。但是由于历史及文化条件限制,鄂尔多斯的正规金融机构及产品相对落后且不足,远不能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因而闲置资金70%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流向了民间融资借贷系统。民间借贷的年利率一般在20%~3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50%^[21]。高昂的利息让本就缺乏经济理财常识的失地农民纷纷将多年的积蓄拿出进行“投资”,有的家庭甚至将征地补偿款尽数拿出参与放贷。看似按月如期到账的利息成为了农民失去土地后“固定”的家庭收入。全新陌生的城市社区、高昂刺激的借贷利息成为了支撑失地农民“家”营建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和要素。但在2011年由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地产泡沫的破裂直接诱发了民间借贷危机,鄂尔多斯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于是,康巴什移民社区搬迁计划与征地拆迁补偿计划开始不同程度的放缓。

为明晰鄂尔多斯失地农民营建“家”的过程与经历。调研人员于2015年至2017年共12次赴康巴什进行实地调研,深入调研集中于2015年7月2日至8月13日、2016年10月1~7日的50d内。调研期间共对15位失地农民与未转移农牧民(编号S1~S15)进行了深度访谈。作者与样本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并在其后进行了多次访谈(表1)。基于家具有不同的研究尺度之考量^[22],本文的研究尺度聚焦于私家住宅空间与移民社区空间。因此,重点走访了移民社区的街道办事处,跟随社区人员入户访谈失地农民,力图尽可能将研究置入康巴什新区的日常生活情境。

表1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 participants in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S1	男	45	环卫工人
S2	女	50	无业
S3	女	35	园艺工人
S4	男	61	无业
S5	女	45	餐厅服务员
S6	男	37	司机
S7	男	65	无业
S8	女	69	无业
S9	男	52	自由职业
S10	男	65	农牧民
S11	女	46	保洁员
S12	男	45	无业
S13	女	37	自由职业
S14	女	54	农牧民
S15	男	58	农牧民

在进入失地农民在移民社区的新家后,以研究者的身份观察他们住宅的空间结构与景观,并邀请他们画出曾经在乡村居住房屋的空间结构,记录后使用空间句法软件分别进行计算与对比,以求直观反映城乡转换后失地农民住宅空间的变化。空间句法是一种对住宅内部空间进行量化,精准剖析空间内在组织结构逻辑的有效研究方法,能够为解析住宅内部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科学依据^[23,24]。

空间句法有诸多的研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J”图与整合度对于空间句法进行运用分析。具体而言,先根据住宅的建筑平面图将失地农民搬迁前后的住宅内部空间分别划分为若干视域凸状空间,再将其抽象为仅有点线结合的关系图解(“J”图)。“J”图可以反映失地农民搬迁前后住宅内部空间不同的分割与连接关系,及其迥异的的空间结构。其中点表示住宅的内部空间(不考虑空间大小),线表示空间连接关系(相连或相隔)^[25]。整合度值是空间句法的核心变量,代表着某一空间在整体住宅空间中的重要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深度值(D):深度值是指某一空间距其他所有空间的最短距离,平均深度值(MD_i)表示系统中某一节点空间 i 距离其余所有空间的拓扑距离之和的均值。计算公式为:

$$MD_i = \sum_{j=1, j \neq i}^n d_{ij} / (n-1) \quad (1)$$

式中, d_{ij} 为从 i 节点空间到 j 节点空间的所经历的拓扑成本(步长); n 为节点总数。

2) 整合度(I):由平均深度值标准化后得到,剔除了系统空间节点数量 n 对平均深度值(MD_i)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RA_i = 2(MD_i - 1) / (n-2) \quad (2)$$

$$D_n = 2 \left\{ n \left[\log_2 \left(\frac{n+2}{3} \right) - 1 \right] + 1 \right\} / (n-1)(n-2) \quad (3)$$

$$RRA_i = RA_i / D_n \quad (4)$$

$$I_i = 1 / RRA_i \quad (5)$$

式中, RA_i 为 MD_i 经过一次标准化后的结果,目的是使参数正态分布; D_n 为标准化参数, RRA_i 为使用 D_n 进行第二次标准化后的结果。

2 研究发现

2.1 失地农民“家”的重构:双重断裂中的“家”

城市化与民间借贷危机双重因素共同重构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新家”,使得“新家”呈现复杂、多元而又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性”之中。具体表现在失地农民住宅中部分空间的消失、弱化(微观家空间的物质变迁)以及移民社区整体认同的区隔、徘徊两大方面(宏观家空间的情感变迁)。

首先,在失地农民微观实体家空间——住宅方面,重构后的住宅中部分空间较搬迁之前而言呈现出弱化或消失状态。利用空间句法对搬迁前后失地农民的住宅内部空间进行对比分析。先根据失地农民搬迁后的住宅形态,抽象出凸状空间图以及最后反映空间形态关系的“J”图(图1)。再根据失地农民回忆后所绘制的搬迁前住宅形态图,抽象出凸状空间图以及“J”图(图2)。

通过对比搬迁前与搬迁后的住宅空间“J”图,搬迁之后重构的失地农民住宅呈现如下特征:外部空间的整合度由搬迁前的0.91下降到搬迁后的0.70,表明搬迁后住宅的整体私密性显著增强,住宅不再是农民们邻里往来实现社交需要的首选空间;住宅中整合度最高的空间由原本可以种植作物的农家院落(整合度2.00)转换为现在楼房中只具有单纯联通功能的走廊过道(整合度4.35),表征着原本住宅中的亲自然空间已然消失;住宅中原本如堆放谷物的粮房、储存煤炭的炭房等生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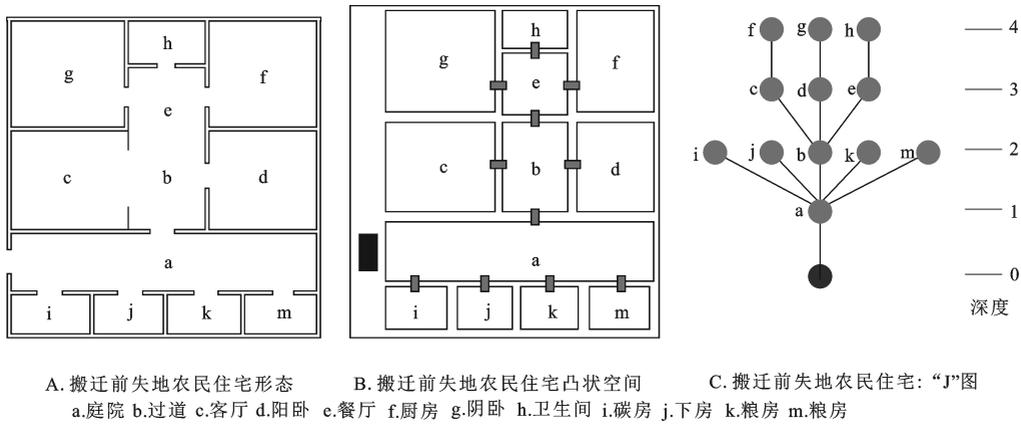


图1 搬迁前失地农民“家”的空间句法示意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ce syntax about home space before resettl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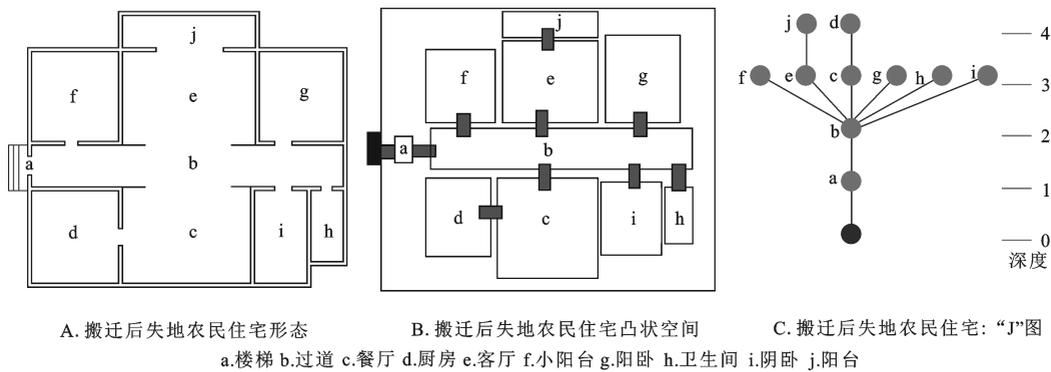


图2 搬迁后失地农民“家”的空间句法示意

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ce syntax about home space after resettlement

空间在搬迁后完全消失,表明进城后与农民原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生活形式被完全抛弃,农民生产生活的经济风险亦随之显著增强。

其次,移民社区整体作为家空间出现了不同群体的认同区隔与徘徊。作为“家门外”的邻居——主城区的市民以及村落区的未迁移农民对移民社区表现出了区隔与徘徊的两种认知态度。在主城区中,全新优雅的生活休闲环境与健全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原本就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市民可以在宽阔的城市空间享受毫无拥挤困扰的城市慢生活。对于移民社区,他们大多表示“听说过,但是很少去,我们和他们没甚关系,那儿就和不是康巴什的也是(那里都不像是属于康巴什的)”(访谈对象S11)、“这儿甚也有(啥都有),去那儿做甚(没必要去那里)”(访谈对象S5)。显然,在“我者”与“他者”“家里”与“家外”界限分明的描述

中,移民社区的城市邻居并没有因为距离的邻近而将移民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在他们眼中,康巴什新区是自己的“家”,而移民社区似乎与康巴什新区并没有关系。

而对于移民社区的乡村邻居,那些未迁移的农民对于是否要融入失地农民的“新家”,一直保持迷茫与徘徊的态度。在迁移农民失去土地没有固定收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失地农民的“新家”是不稳定且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感觉不搬迁是最正确的选择,“不搬起码饿不死,有地种还有一口饭吃”(访谈对象S15)。但是当遭遇例如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困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能种庄稼而又没有了原本的社区可以提供帮助时,无助的他们又会羡慕城市失地农民环境优越的“家”,后悔当初没有选择搬迁。“现在才发现,人都走了自己也待不住。连个能照应的邻居也么(没有)。现

在村里早的连水也喝不上,也么人一起想办法”(访谈对象S10)、“唉,那时候赶不知道么,早知道搬不搬都可能没个吃上的,还不如搬过个住的优越点”(访谈对象S15)。未迁移农民的犹豫与反复,使得失地农民“新家”的未来愈加迷惑。

总之,虽然政府与农民是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了家的重构,但重构后的“家”依然出现了“双重断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第一,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脆弱性给家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第二,地方政府在发展城市新区伊始并未充分的意识到,在同样的城市新区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融合差异问题。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失地农民为扎根城市是如何努力对于现阶段的断裂状态进行协商的。

2.2 失地农民基于日常生活“家”协商

2.2.1 经济来源

经济资本是“家”的营建所必须的物质本底。当没有了农业生计的保障,获得稳定的工作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失地农民对进入城市后的新工作充满了渴望,纷纷努力想要寻找工作维持家庭生活。在移民社区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了许多在康巴什主城区的工作机会。但主城区的工作大多属于服务业,雇佣有性别、文化等条件的限制,且被雇佣的农民又大多会因为距离太远与通勤成本而放弃。所以,为生计做出的努力与现实差距的对立,使得一些青壮年失地农民直接放弃工作在家待业,并对城市中“家”的未来产生失落与无奈感。

而对于家庭积蓄而言,在鄂尔多斯的民间金融风暴后,失地农民毕生的积蓄或多或少受到损失,有些家庭的征地补偿款甚至全部血本无归。由于民间借贷关系通常是在亲缘和信任基础上建立的,集资者通常都是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的亲人与挚友。所以,集资者并不会完全背信弃义撕毁契约,而是重新制定规则,建立起新的以物易物的资产置换关系。新的置换约定不论农民是否真的需要所置换物品,规则都是由城市的集资者制定,失地农民只有或接受或一无所有的“选择”权。“我们农村人,甚也不懂,当时看见东胜(鄂尔多斯最繁华的城区)的亲亲们(亲戚们)尽放了么,我们也么甚收入就跟上放”(访谈对象S14)、“你去问问这面儿(鄂尔多斯)谁们家么(没)放过,现在

赔塌了(要不回钱),我们农民也不会(懂)像(城里人)他们那种打官司,闹不过人家,快能给多少给多少哇,换点钱敢是要吃饭了么,娃娃们还要上学了么”(访谈对象S12)。失地农民对于进入城市生活后的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显得毫无防备与招架之力。个体家庭营建过程中的生计受到原本乡村中从未体会过的挑战与冲击,甚至连失地农民微弱的协商规则都是由城市资本、权力所运作与把控。

2.2.2 情感归属

失地农民在城市中家的意义充满了向往与怀旧两种情感的交织。在对住宅空间的营建过程中,失地农民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被更加清晰地构建,家中的景观亦被融入了新的情感意义。首先,他们尝试着运用自己对城市现代生活的理解,选择他们认为流行与时尚的元素对住宅进行装修。壁纸、挂画等摆件被用于装饰客厅,马桶、电热水器与洗衣机等应有尽有。经过在楼房中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们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这些他们曾经认为的“高科技”,并表示这些现代化家具让家里更便利、更干净。在夸赞城市“新家”的同时,失地农民却又表达着对乡村“老家”怀旧与回忆的情怀,并尽可能在住宅中保留能带给他们乡村生活回忆的物品。原本以土地为衣食的农民面对牢固的历史记忆,即便是全然陌生的城市生活空间,仍然努力地寻找着向原有乡村生活靠近的可能。例如受访者S4的家,两室一厅一卫共180 m²。客厅旁是2个卧室,卧室中的2张大床都是请木匠专门定做的“木炕”。至于为何选择制作“木炕”,接受访者的说法就是:“洋床太软,咱睡不惯甚。睡了一辈子炕,一定要做成这种形状才能睡着”。“木炕”浓厚陈旧的乡土风格与一旁新购置的绸缎面欧式风格窗帘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对大部分失地农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老旧家具的接触与互动犹如不可或缺的仪式,展演着曾经乡村生活的重要性,维系着农民对回不去的“老家”厚重的依恋^[26]。总之,失地农民“家”的意义出现了这样的情感悖论:一方面,迎合并夸赞城市家中的全新生活,以此来刻意地建构着自己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却又表达着因为乡村家园的消失而无法掩盖的忧伤与落寞。

2.2.3 社会交往

失地农民迁入移民区之后,原本基于亲缘、乡

缘与血缘建立的社会网络出现了断裂。在新家之中的社会交往主要体现在将移民社区整体作为“家”进行营建时,失地农民的内部交往以及失地农民与周边邻居的交往中。首先,失地农民并未像先前研究所述的那样受到强烈的社会空间排斥^[27],进入城市后他们在“新家”中建立了新的基于移民社区尺度的休闲与交往模式。一方面,失地农民在移民社区中进行着最令他们舒服与放松的休闲实践,原本彼此并不相识的失地农民三五成群地挨坐在社区的草坪或阴凉地里,盘着腿、弓着背靠在一起,晒着太阳聊天话家常,建立起彼此“面熟”“拉过话(聊过天)”的松散型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失地农民不再愿意像在农村里一样,与周边的邻里进行频繁的走家串户,理由是“不方便”“铺了地板砖怕给人家踩脏”,原本亲密频繁的邻里社交变成了偶遇时的点头微笑与日常寒暄。

而对于康巴什主城区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当初未搬迁的村民,失地农民也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认知与态度。无论迁与不迁,失地农民都认为村里人始终是一家人。虽然没有选择搬迁,但村落区的农民始终与移民区的失地农民保持着交往,他们频繁的来往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失地农民在移民社区的新家成为了他们在乡村支离破碎的家的后援与依靠。当未迁移的农民收成不好或遇到困难,搬进城市的老邻居无论自家的收入与条件,都会尽力给予援助。“今年一年旱的甚也种不成,我又一个人孤的不行,经常来他们家住,老邻居好啊,住这么久甚闲话不说”(访谈对象S15)。而对于空间距离相似的主城区,失地农民则更像是“游客”,表示那里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只有在参加婚宴或偶尔消遣时才会去主城区,那里只是“偶尔逛逛还行”的地方。“出个以后(去到主城区),这也贵那也贵,他们(主城区居民)爱的(欣赏的)我们不爱,转一会就想赶快回来。一回来社区看见咱们的房房(房子)就觉见安全兰,觉见到家兰(到家了)”(访谈对象S7)。因此,在失地农民内部以及他们与未迁移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移民社区成为了他们的“家”,是他们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地方。但同时与市民较少的互动也使得这里成为了与主城区愈加区隔的地方,好似一块“异化”的“飞地”镶嵌在城市的边缘。

3 结论与讨论

鄂尔多斯失地农民“家”的营建过程具有普遍性,是现阶段中国快速城镇化农民生境的部分真实写照。但同时这一过程又是极其特殊的,鄂尔多斯典型资源型城市具有波动性的发展态势,使得我们可以更快速、更直接地探查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营建“家”的努力与困难。研究突破了传统失地农民研究中地方政府与农民二元对立的框架前提,为真正打破壁垒促进农民在城市的融入提供了新的思考与借鉴。在民间借贷危机与快速城镇化的压力下,失地农民的“家”中处于一种复杂、矛盾而又充满忧虑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并非消极地接纳社会现实的安排,而是通过在城市“新家”中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

但即便如此,这些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首先,陌生的城市生活与民间借贷风波使得失地农民损失了生平积蓄并无法获取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次,他们找不到确切的情感归属与定位,在对市民身份的迎合与农民身份的怀旧中迷茫徘徊。最后,在对内与对外的社会交往中,失地农民努力维持着原有的乡缘关系而并不会刻意的与市民构建全新的社交网络,这使得移民社区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但“家”却成为了与主流城市空间显著区隔的地方。诚然,由乡村到城市的水平流动使得农民在城市能够有房可居,但获取经济资本、建构社交网络以及衔接地方情感的障碍似乎阻滞了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垂直流动,同时也阻隔了与家空间相连的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憧憬与期望。也就是说,即使“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一个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在社会结构性的差异下他们仍然很难通过各种协商规则去实现扎根城市的愿景与想象。

本研究将失地农民问题引入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领域中,在一定意义上响应并延展了关于Akesson B等人的关于家的破坏(domicide)的研究话题^[28,29]。但本文认为被动迁移的居民并不总是通过各种途径抵抗(resistance)并想要回归原本的生活,并且过多的集中关注家中人如何对抗“老家”的不复存在并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积极表

现。因为“老家”的拆毁不意味着希望的断裂,真正的迷惘往往是建立在对“新家”营建的无助之上。只有在对家的协商困境进行剖析后,才能真正的打破壁垒促进农民在城市的融入,让城乡共享城市化的发展红利。研究亦响应了以往研究对于鄂尔多斯康巴什的“鬼城”之说的挑战^[30],继续深化了对于中国城市新区的研究^[31,32],通过对康巴什失地农民的研究证明,康巴什并非是“无家”(un-homely)的“鬼城”,而是不同类型居民持续营建并不断赋予之新的地方意义的“家”。期望后续研究能够关注到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其他边缘群体,对不同主体在“家”的营建过程中主体性及协商策略发挥做出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谢圣远. 失地农民问题与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J]. 经济地理, 2007, 27(6):910-912. [Xie Shengyuan. The problems of land-deprived peasants relevant to improvement for land management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6): 910-912.]
- [2] 刘云刚, 殷冠文.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以鹤壁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7): 887-896. [Liu Yungang, Yin Guanwen. Local government-oriented city making in 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Hebei, a mining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7): 887-896.]
- [3] 韩淑娟.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7): 52-58. [Han Shujuan. Effect of resource endowmen to urbanization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7): 52-58.]
- [4] 李少星, 颜培霞.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多尺度考察[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 17(6): 44-49. [Li Shaoxing, Yan Peixia. A multi-scal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6):44-49.]
- [5] Shao Q. Shanghai gone: Domicide and defiance in a Chinese megacity[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 [6] Sargeson S. Villains, victims and aspiring proprietors: Framing 'land-losing villagers' in China's strategies of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7):757-777.
- [7] Lian H. The resistanc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 36(3):185-200.
- [8] Sargeson S. Violence as development: Land expropriation and China's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3, 40(S6):1063-1085.
- [9] 顾朝林, 李阿琳. 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J]. 经济地理, 2013, 33(1): 138-148. [Gu Chaolin, Li Alin. A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plann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From 'city exploiting rural area' to solving 'three issues in rural area'.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1):138-148.]
- [10] 罗忠勇, 漆雨烟. 被征地农民的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8县市被征地农民的调查[J]. 经济地理, 2013, 33(8):134-141. [Luo Zhongyong, Qi Yuyan. Perception in old-age insurance duty of land-expropriated peasants and the factor affecting it: Based on land-expropriated peasants in 8 country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8): 134-141.]
- [11] He S, Liu Y, Webster C et al. Property rights redistribution, entitlement failure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landless farmers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09, 46(9):1925-1949.
- [12] Hui E C M, Bao H J, Zhang X L. The policy and praxis of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s in China: An apprais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J]. Land Use Policy, 2013, 32:309-316.
- [13] Bowlby S, Gregory S, McKie L. 'Doing home': Patriarchy, caring, and space[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97, 20(3):343-350.
- [14] Mallett S. Understanding hom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52(1):62-89.
- [15] Blunt A, Varley A. Geographies of hom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4, 11(1):3-6.
- [16] Alison B. Dowling R. Home[M].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 [17] 封丹, 李鹏, 朱兹.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7):809-817. [Feng Dan, Li Peng, Zhu Hong.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7):809- 817.]
- [18] Feng D, Breitung W, Zhu H. Creating and defending concepts of home in suburban Guangzhou[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4, 55(4):381-403.
- [19] 白亚楠, 刘伟. 资源型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践——以鄂尔多斯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1):172-175. [Bai Yanan, Liu Wei. Practice of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Taking Ordos as an example. Urban Studies, 2010, 17(1):172-175.]
- [20] 施宏. 鄂尔多斯现实困境探究和低碳经济出路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12 (9):62-65. [Shi Ho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ilemma of Ordos and the establishment mechanism of its low carbon economy. Social Scientist, 2012 (9):62-65.]
- [21] 雷立钧, 袁世瑜. 民间金融对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社会影响分析[J]. 北方经济, 2009, 11(6):28-30. [Lei Lijun, Yuan Shiyu.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private finance on the ordos region. Northern Economy, 2009, 11(6):28-30.]
- [22] Su X B.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50-61.
- [23] 丁传标, 古恒宇, 陶伟. 空间句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进展评述[J]. 热带地理, 2015, 35(4):515-521. [Ding Chuanbiao, Gu Hengyu, Tao Wei.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space syntax i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4):515-521.]
- [24] 丁传标, 张涵, 程明洋, 等. 城中村空间形态对居民居住安全

- 感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4):68-73.[Ding Chuanbiao, Zhang Han, Cheng Mingyang et al.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residents living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form in Zhucun Village, Guangzhou Cit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5, 34(4):68-73.]
- [25] 陶伟, 丁传标. 家的解码:空间句法对家空间研究的内容与方法[J]. 地理科学, 2015, 35(11):1364-1371. [Tao Wei, Ding Chuanbiao. Decoding homes: Application of space syntax to content and methods of home spa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1):1364-1371.]
- [26] Mazumdar S, Mazumdar S. Immigrant home gardens: Places of religion, culture, ecology, and famil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105(3):258-265.
- [27] Wang L. Social exclusion and education inequality: Toward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urban-rural divide in China[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2, 33(3):409-430.
- [28] Akesson B. 'We may go, but this is my home': Experiences of domicile and resistance for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J]. *Journal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4, 4(2):9-22.
- [29] Akesson B. Castle and cage: Meanings of home for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families[J]. *Global Social Welfare*, 2014, 1(2): 81-95.
- [30] Yin D, Qian J, Zhu H. Living in the 'Ghost City': Media discours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home in Ordos, Inner Mongolia,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7, 9(11):2029.
- [31] 殷冠文.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与城市化: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7):1082-1092. [Yin Guanwen. Local government-led capital circuit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Kangbashi New District, Ordos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7):1082-1092.]
- [32] Yin G, Liu Y, Wang F. Emerging Chinese new towns: Local government-directed capital switching in inland China[J]. *Cities*, 2018, 79:102-112.

Re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ity: A Case Study of Ordos

Yin Duo^{1,2}, Gao Quan^{1,2,3}, Yang Mengqi^{1,2}

(1.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ewcastle University, Newcastle NE1 7RU, UK*)

Abstract: Amidst China's urbanization, land-lost peasants who migrated from the countryside aspire for establishing 'new homes' and settling down in the city.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of the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 communities in a recourse-based city, Ordos, exploring the ways and problems that land-lost peasants reconstruct their new hom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private lending crisis and forced urbanization, the 'new homes' of land-lost peasants were caught into a state of hyper-uncertainty. Yet, the land-lost peasants were able to actively reconstruct the material and emotional meanings of home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s in response to such uncertainties. Although home-making provided emotional impetus for land-lost peasants to continue their new life in the cities, they were not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actually-existing precariousnes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which placed their "new homes" into multiple marginalization.

Key words: land-lost farmers; home; reconstructing; negotiation; Ordos